

文史资料丛书

陈賡同志在上海

穆欣著



陈赓同志在上海

——在中央特科的斗争经历

穆欣

（内部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 3/16印张 70,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3,500册

统一书号：11224·1 定价 0.35元

K822/38

文史资料丛书

陈赓同志在上海

——在中央特科的斗争经历

穆欣著

文史资料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陈赓同志在上海》是穆欣同志写的《陈赓传》中的一章。它记述了陈赓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期间，为保卫党中央，同国内外反动派历次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同时，通过陈赓同志参与的历次斗争，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一年间中央特科在各方面进行的革命斗争。作者为写这本书，曾经多次访问过陈赓同志和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李强、陈养山、刘鼎、柯麟等同志，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因此，这本书对于研究这个时期党在隐蔽斗争方面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 (一) 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机智英勇地保卫
党中央…………… (6)
- (二) 主持情报科工作，建立了第一个反间
谍关系…………… (22)
- (三) 派人钻进敌人心脏，直接取得重要情
报…………… (34)
- (四) 多方侦知情况，营救被捕的领导同志…………… (44)
- (五) 严惩叛徒白鑫，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53)
- (六) 摆脱隐蔽斗争中的恐怖行动，把斗争
重点转向政治领域…………… (70)
- (七) 参与粉碎叛徒的破坏阴谋，扑灭一场
大祸害…………… (80)
- (八) 到天津营救被捕的同志，同叛徒作斗
争…………… (91)
- 后记…………… (100)

陈赓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参加南昌起义，向广东潮汕进军途中左腿负重伤。其后经过千辛万苦，经由汕头、香港到达上海。这时已是十月上旬，他和同船到达的周逸群同志，在上海很快找到了党的中央。

党帮助他住进上海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腿伤。经几个月的治疗，才把左腿上的伤口治好，将折断的腿骨接起来。牛惠霖曾经留学英国，和他弟弟牛惠生（曾留学美国）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政治思想倾向进步。因为他们的医术高超，在上海很有名望，许多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和有钱的阔佬都找他治病，也时常有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在这里进进出出。陈赓同志初进去的时候，这位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腿是在盗窃的时候摔坏的，不很乐意医治。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够解除对方的猜疑。当时陈赓同志觉得，与其被怀疑作强盗，还是承认本来面目的好；又见医生为人比较正直忠厚，便把自己的真情告诉了他。医生听完陈赓的叙述，深受感动，对他非常友好。这位大夫还问陈赓为什么不早说？原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先生的亲表兄弟，一向同情革命。陈赓同志谈过自己的真实情况以后，牛惠霖

大夫马上告诉了宋庆龄先生。宋庆龄在广州的时候就认识陈赓，她又是南昌起义时候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如今得知陈赓同志在南昌起义中负伤并已来到上海治疗，非常关切，就向牛氏兄弟嘱咐，一定要把陈赓同志的腿给治好，也要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南昌起义部队来的伤病员同志。从此牛惠霖大夫对他就更加热情，非常认真地给他治疗，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陈赓同志是九月一日在江西会昌战斗中受的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进军途中虽经接上，但接歪了，又经两个来月辗转流亡，艰苦奔波，伤势恶化。按照他的病情，通常只好截肢完事，但他坚决反对截肢。牛氏兄弟满足了他的愿望，重新给他接起，把这条腿救下来，保住多处负伤的残肢，得以继续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战了三十多年，这对陈赓同志来说，乃是无比的幸福。如果不是在设备条件先进的上海，没有牛氏兄弟高超的医术，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他对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很久以后，每逢提到还是赞不绝口。

陈赓同志很快发现，这家医院里面住有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这些人在上海的头头，还到医院里看望过他们。陈赓怕被他们认出，藏在病房里避不露面。可是，在他腿伤快要治愈的时候，忽然又有一个国民党的团长住进这家医院里来，而且刚好住在陈赓同志的病房隔壁。此人也是黄埔生，认识陈赓。有一天，他的马弁认出陈赓，跟着他本人也过来攀谈，并且询问他的腿是怎样受重伤的？他不相信陈赓临时向他编造的故事，认为陈赓扯谎。陈赓同志晓得这个人的思想极端反动，继续留在医院里面会有危险，所

以此人刚一走开，他就当机立断，连对牛惠霖大夫都来不及打个招呼，马上便请当时也住在这家医院里面的一位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过了几天，牛惠霖大夫在马路上遇到陈赓，立刻把车停住，跳出来紧紧握住陈赓的手，问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陈赓把逃离医院的原因告诉他的时候，牛惠霖大夫带着遗憾的神情说：早该给你找间好一点的房间。

（一）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机智 英勇地保卫党中央

陈赓同志从牛惠霖的医院出来，又在家里疗养一段时间。一九二八年四月，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遵照党中央的决定，他就上海参加了党的特科工作。他从这个时候开始转入地下，与中外反动派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而又极其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

陈赓同志在医院治伤期间，上海党中央正在筹划成立中央特科。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而创建的一个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保卫工作组织，在中央特委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

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同时兼及武汉、平津、香港等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等所在地的重要城市。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中心。这里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英勇善战的革命传统。上海又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畸形城市，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分子统治、压榨、奴役我国的基地，是著名的“冒险家的乐园”。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就有无数装着大幌子的商贾，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打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他们的背后，那些没有祖国的亡命客，没有护照的刑事犯罪分子，贩运人口的经纪人，私卖鸦片的捐客，杀人越货的海盗，一个个在“领事裁判权”^①的大熏下面接踵而至，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作最后的逋逃藪。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外国冒险家以及依附他们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纠合利用的帮会、地痞、流氓分子，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不同政治信仰的各阶层人士。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给我们的革命活动带来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这里租界^②地区较大，华洋杂处，政出多门，敌人营垒内矛盾重重，革命者可利用的空隙很多；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住房易找，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比较方便，便于掩护，这比任何城市的条件都要好

①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始于一八四三年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特权即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如果成为民间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裁判。

② 租界：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制清政府承认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即强占他们认为合宜的地方做为他们的“租界”，在租界内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当年沿海的大城市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和内地的汉口、九江、万县等地都曾设有租界。

些。因此，党的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全都设在这里。但在另一方面，上海的敌情复杂，又给党的活动带来许多特殊的困难：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包括外国军队、中外巡捕、包探、流氓等）云集上海，各个租界俨然是“国中之国”，工部局就是殖民政府。这里军警遍地，捕房林立，统治森严；“在每一条路的转角上或交叉处，总有一个穿制服的神气活现的家伙屹立着，在公共租界，立着的是印度人；在法租界，立着安南人。此外还有许多帝俄的末路王公或者退职将帅荷着枪在做巡逻工作。”^①其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华界”，驻有重兵以及宪兵、警察、特务机关等，张牙舞爪，杀气腾腾。

当时党中央虽然设立在法租界，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务警探，却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党的负责同志和党团员、工人领袖，每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当时有一些人变节投降敌人，这些出卖灵魂的叛徒，也同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出卖革命者和党的机密。这些叛徒曾经一度非常猖狂，如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底，由于江苏省委一个交通被捕叛变，向敌人告密，致使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②、组织部长郭伯和同志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相继被捕。韩步先被捕后叛变，不但指认了陈延年、郭伯和两同志，使他们遭到敌人的杀害，并且还供出了另一位江苏省

① 包玉珂编译：《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文化出版社）第32页。

② 陈延年同志，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回国，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六月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被捕，牺牲于上海，时年二十八岁。

委负责人赵世炎同志^①的住地，带着包探来捉人，致使赵世炎同志遭到杀害。这年秋季，党中央初回上海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仍旧没有改变。这样一些无耻的狗东西，还是照旧在马路上海摇来摆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这对上海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如果没有秘密的保卫工作，就很难立足。而无耻叛徒的猖狂活动，向党挑战，更加激起大家的愤慨。如何打击这些无耻叛徒及其主子的危害，如何保卫党中央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安全，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就是专为保卫上海党的组织安全而创设的政治保卫机构。它是党中央的侦察兵，是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突击队。

党中央在武汉时期就开始着手建立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当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时候，党和人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击，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革命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即从上海迁移武汉，并于四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时候，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同志和许多负责中央工作的同志的重视。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一九二七年五月间，在中央军委下面，成立了

^①赵世炎同志，四川酉阳人。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回国。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同年七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六岁。

以情报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工作处。当时军事委员会书记是周恩来同志，王一飞同志任军委秘书长，聂荣臻同志任军委参谋长。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后，中央军委的任务特别繁重，它要筹划部署中央全面的军事工作，时刻准备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进行军事斗争。新建立的情报工作，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多次发动暴乱，企图消灭武汉革命力量，党的情报工作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及时地揭露了敌人的军事阴谋。有关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阴谋计划，如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六月十二日汪精卫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谈；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同冯玉祥在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七月十四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提出反共，等等。我们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对于这些重大事件，都能及时获得情报，使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遭受突然袭击，和有准备地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因为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虽然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却未能根据敌我斗争形势及时作出应有的对策，未能不失时机地给予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中央迁回上海以后，为了镇压叛徒特务的猖狂气焰，先将随同中央从汉口迁到上海的、曾在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一些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选拔出一些优秀分子，在中央特科设立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红队。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这些老战士，是从“五卅”大罢工开始战斗过来的。他们都曾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又经历了几次武装起义的锻炼，富有斗争的经验。他们就是红队的骨干。红队建立起来以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几个公开的叛徒，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再不

敢那样猖狂活动了。但是对于隐蔽的叛徒奸细，由于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无法对付。这些敌人大多是被国民党侦察机关收买以后，秘密加以利用，对党进行暗害，或者打进来做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蔽的敌人，党中央提出建立反间谍工作，打入敌人侦探机关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由陈赓同志领导，逐步地开展了反间谍工作。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适应工作的需要，组织机构日臻健全，逐渐建立了四个科：第一科(总务科)专做总务事项，第二科(情报科)专做情报工作，第三科(行动科)专做保护工作，第四科(交通科)专负秘密交通责任。

一科建立最早。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汉口迁回上海的时候，要在上海设立各种领导机构，需要采购各种物资设备和布置机关，租赁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所需房屋，就成立了专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特科正式成立以后，这个“总部”就改为一科。一科工作的特点，是和党中央的关系最密切，工作既多又杂，必须做得非常机密、稳妥，稍有粗心大意，就会直接影响党中央的安全。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俱，打铺保，做生意，以至对牺牲了的同志负责收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这些事情看来琐碎，也和特科其他工作一样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而且许多工作都要和其他科密切配合)。即以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为例，就使一科和红队的同志耗费过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每逢召开重要的会议，先由一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即

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妆小商贩在房前、房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外围人员发出报警的信号，在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的会场，布置在法租界一幢公馆里。楼上开会，楼下由一、二科的女同志打牌，开留声机掩护，三科派来的红队队员，穿上厨师的衣服负责保卫会场安全，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又如一九三〇年初，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来因为代表不齐，改为苏维埃代表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一科和三科互相配合，进行了如下的周密布置：在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的会议厅。一楼由一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等职，负责接待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琐事，防止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赓同志叫刘鼎同志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间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同志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房走出大门转移。为了确保安全，三科还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同志的住房转移出去。为此，陈赓同志等曾经多次到医院里检查、筹划。当时，一科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达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入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许外出。开会

以前，这里完全按照普通医院的秩序办事，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之日，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象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都走得无影无踪。

一科负责的工作，还有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购置、保管武器和一些特殊用品；建立各种掩护机关为中央服务，等等。为了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特科在中央特委领导下，曾经动员很大力量和各种社会关系，不惜巨款，不顾危险，积极进行营救。为了购置武器，一科也建立了不少利用关系，和在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一九三〇年特科通过中央军委，就曾在上海一家外国洋行里买过许多枪支。当时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西北角转角的“三民照相馆”，就是一科储存武器的地方之一。一科还担负运送武器的任务。有时派女同志运送武器，以减少抄靶子的敌人的怀疑。武器多的时候，常由女同志打扮成阔绰的太太小姐模样，坐着流线型的卧车运送。为了租房子打铺保，给中央机关安置必要的家俱，一科用开铺子做生意的形式，建立了掩护秘密工作的各种机构。例如，利用可靠的水电行，给我们秘密机关安装水电工程或打铺保；营救被捕同志的时候，有时也用它出面作保。为了及时供应中央机关家俱，或在机关撤销后便于保管家俱，一科在北京路开了一家木器店。此外，还建立了一些秘密接头和转递文件的机构。如在北京路开设一个代办婚丧喜庆礼物的“信谊代办所”，就是为此目的而建立的。

当时同特科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一位蔡绍敦(又名叔厚)同志。

他会日文，在上海东有恒路开办一家“绍敦电器公司”（以后迁到福煦路），专门制作霓虹灯用的变压器；他还在一家纱厂里当电器设备顾问。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进步，同情革命，非常热心帮助我们。特科的四个科都常找他帮忙办事，许多人都认识他，叫他“蔡老板”。那时有些同志从监狱里刚出来，或者党的机关遭到破坏后，暂时没有地方可去，只要去找他，他总热情接待，安排生活，多的时候能为我们的同志开两桌饭。我们不论有什么事情找他，他都乐于帮忙。李强同志主持特科四科的时候，科里的电器修理工具经常存放在蔡绍敦家的楼上，并且经常派两个工人在那里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零件。（这样一位当年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热情帮助过我们的进步朋友，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却被他们迫害死了。——现已平反。）

三科的工作，主要是领导红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安全进行。红队于一九二七年秋建立以后，中央特科就以红队作为保卫党的主要手段，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对于保卫党的安全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支被称作“打狗队”的红队，当时在上海很出名。开头一个时期，国民党特务警宪和外国的包探巡捕都晓得共产党有四条枪。他们从历次在上海发生的案件分析，认为当时“打狗队”所有的武器就是四条手枪。但是，这四条枪可以横冲直闯，在上海打遍天下。由于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阶级的余威还在，红队镇压叛徒特务得心应手，战果辉煌，曾引起敌人的震惊和惶恐。当时党在社会上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巡捕、警察都不敢动它；有时发现传单，他们也不敢干预。直到党的活动有人告发，巡捕方敢破案。他们出动捕人的时候，也是吵

吵嚷嚷，把人轰走。

但在红队成立初期，因为尚未建立起反间谍的情报工作系统，不能事前制止敌人的破坏，只能在事后查明叛徒的活动，予以镇压。由于初期缺乏工作经验，也曾在行动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差。一九二八年中央特科成立情报科后，红队的工作起了很大变化。因为通过情报工作，可以及时从敌人内部得到叛徒奸细活动的情报，不必太费周折，就能准确及时的镇压叛徒。有时还能事先发现敌人的阴谋，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这样，等于红队长于耳目，工作更加主动，执行任务也更加顺利。红队曾在这个时期完成许多艰巨的任务，而没有发生问题，这同情报科反间谍工作的紧密配合是分不开的。

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了顶点：人员共有四十多名，主要武器有白朗宁（一种手枪的牌号）、左轮、驳壳枪，另有一批化学手榴弹，能使敌人流泪，大家管它叫“流泪弹”。每次行动以后，遇有敌人追捕，就扔出去，迟滞敌人（自己戴上特制的眼镜，不受影响）。当时三科能从外面随时调动枪支，甚至能够调来机枪。（这个时期，特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的炮兵中都建立了联系。）还能随时从洋行里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的时候，一科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红队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特科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是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紧急关头就扔掉了。

红队在镇压叛徒奸细的英勇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保卫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机智善战，极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的任务。红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同党中央对它的精心培养分不开的。红